

阎又文:去世31年才“曝光”的潜伏者

今年是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,正在北京市档案馆展出的“北平和平解放史料展”,拨开了真实版“潜伏”的冰山一角。

阎又文,这个陌生的名字,与刘厚同、何思源、傅冬菊三人并列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,肖像置于显著位置。

新中国成立前,他表面身份是傅作义秘书、国民党少将,实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员;新中国成立后,他明为国民党起义将领,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。直到他逝世31年后的1993年,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才为其子女得知,而他的故事和功绩,仍不为大众所知。

记者日前多方采访,为读者再现这个真实版的“潜伏”故事。

身份谜团

1962年,在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任上的阎又文在京病逝,时年48岁。

阎又文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。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碑文:“阎又文同志,山西省万荣县人,生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。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,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,中国共产党党员……阎又文同志,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……”

这段碑文,有几处措辞让人颇费思量:既为共产党员,按常理该写明参加革命时间和入党时间,但碑文中没有。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的历任职务清楚,但新中国成立前的部分却代之以语焉不详的“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”。

但在1962年,阎又文的家人面对这个不同寻常的碑文,心中有许多问号却无处释疑。

阎又文有六个子女。他去世时,老大24岁,最小的只有8岁。他们填写家庭出身时都是“革干”(革命干部),1949年以前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及其亲属都是如此。

他们没想到,若干年后,父亲的身份却成了一个自己家人也解不开的谜团。

谜团集中出现在一家人入党、提干时的政审上。从阎又文的妻子到小女儿,“一到政审就卡壳。”政审的结论一般不向当事人透露,阎家人并不了解内情。直到老六在部队申请入党,部队多次向农业部发函外调政审,却仍然找不到清晰的答案,得到的回答都是“阎又文同志历史问题不清楚”。

阎家子女找到统战部。国民党起义军官的档案应该都在这里,可是,统战部的名册中居然查不到阎又文的名字。

直到1993年,阎家子女对父亲身份的求索才出现了拐点。

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曾是阎又文二女儿的领导。刘光人对阎又文不算陌生。他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,公开的身份是《平明日报》的记者,而阎又文是傅作义的秘书,兼任华北“剿总”新闻处处长,两人多有接触。

时隔60多年,记者采访刘光人时,他仍清晰地记得阎又文的形象:“他细长身材,高高瘦瘦的,说话文文静静,像一介书生。”因为《平明日报》是傅作义的报纸,阎又文对刘光人还多有关照,但双方皆不知对方的真实身份。

1993年,刘光人遇到了曾经的老同事、同样是老地下工作者的王玉,聊天中谈及阎又文后人。没想到王玉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。刘光人回忆,王玉先是长叹一声,然后对他说:“已经40多年了,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了。你一定要帮我联系到阎又文的子女。”

王玉揭开的谜底证明了刘光人的猜测:阎又文是我党深度

潜伏的隐蔽战士。而王玉,就是和阎又文绝密单线联系的联系人。

再次搭线

1945年8月,抗日战争胜利。就在日本投降几天后,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(简称边保)工作的王玉接到了上级交派的任务:到绥远(今内蒙古)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。

此时,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快7年了。

音信全无7年,阎又文还会是当年的阎又文吗?边保的领导提醒王玉,阎又文有变坏的可能,但以组织对他的了解,更大的可能是他仍然是党的好党员,忠于党的信仰。

阎又文1914年出生,与傅作义是小同乡,同为山西省荣河县(今万荣县)人。在山西大学读书时,阎又文就参加了地下党员杜任之、张友渔等领导的进步文化活动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阎又文原计划到延安参加革命,后来按照邢西萍(徐冰)的安排,到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中从事抗日工作。

阎又文才华出众、文笔锋锐,很快得到傅作义的赏识,做了傅的私人秘书。1938年,国共合作期间,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在傅作义的部队协助政工,秘密发展阎又文入党。

1939年下半年,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,傅作义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,共产党的政工干部被“礼送出境”。由于事出紧急,党组织来不及做出妥当安排,阎又文自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。

1946年春节后,王玉化装来到包头。遇到一个国民党军官叫薛起禄,是傅作义部队司令部机要室的秘书。

王玉“捎带着”询问了一下阎又文。薛起禄给了王玉最需要的信息:“阎又文,他是傅长官的秘书啊!”

王玉闻之大喜,放开手段笼络薛起禄,请客、送礼自不在话下。几天后,薛起禄把王玉带进了戒备森严的傅作义长官司令部阎又文的办公室,见到了阎又文,但没有相认。

几天后,王玉打听到阎又文的家庭住址,提了两盒糕点直接登门拜访。王玉接连问了三个问题:“你叫阎又文吗?”“你是山西荣河人?”“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?”

阎又文先是疑惑不解,很快转为慎重,点头称是。

双方对视了一下,王玉决定单刀直入:“阎又文同志,我是从延安来的,党中央派我来找你。”阎又文情绪激动地跨前一步,握住王玉的手说:“多少年了,我总盼着这一天啊!”

绝密单线

阎又文领着王玉上了大街,走进自己投资开设的一家布店。两人进了经理室,把门一关,这才畅谈起来。此后,这家布店就成了两人的联络点。

王玉来之前,边保的领导交代任务时,特意嘱咐,一是和阎又文建立绝密单线联系,不允许和任何地方组织发生关系;二是要阎又文了解和掌握重大的具有战略性的政治军事情报,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。“别的一律不要搞”,以免增加暴露的风险。

在敌占区,与阎又文联系的只有王玉一个人。而即使在解放区,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也只有边保和中央社会部的几位高层领导,再往上,则直接联系到周恩来、毛泽东。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央社会部,这条情报线更被压缩到阎又文——王玉——罗青长(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,主管情报工作)、李克农(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),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



阎又文



以国民党军官面貌示人的阎又文和妻子合影照

线的重视和保护。这也成了日后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的重要原因。

彼时,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,上校军衔,并兼任十二战区机关报《奋斗日报》社长。更为有利的条件是,他是傅作义的随身机要秘书,深得傅作义的赏识和信任。

傅作义主持的军事、政治会议,都由阎又文负责记录,傅作义的重要电报、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。傅作义曾对周围的人说:“只有又文写出的东西和我的思想吻合,他用的语言和我想要说的一样。”傅作义不会想到,竟然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成了最了解他想法的人。

阎又文和王玉在布店里先后密谈了几次,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、作战计划、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和蒋的矛盾作了详细的讲述。阎又文特别提到,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,他的部队有可能会进攻绥东解放区。

王玉找到驻扎在绥东丰镇的华北野战军某部,但接待王玉的部队领导听后,却摇摇头说:“你这个材料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。”

果然,1946年6月间,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,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,绥东战役开始,傅部相继占领了集宁、丰镇、阳高、张家口等地。

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、人称“龙潭三杰”之一的李克农曾语气沉重地总结:华北战场的关系转到中央社会部,这条情报线更被压缩到阎又文——王玉——罗青长(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,主管情报工作)、李克农(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),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

部长罗青长这样评价:阎又文的情报,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的损失起了重要作用。

“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!”

1946年9月初攻占卓资山,17日攻占集宁,19日攻占丰镇,矛头直指我党在华北地区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……绥东战役的节节“胜利”,让傅作义部队大有“横扫千军”的气势,骄横不可一世。

此时的傅作义,也对这些战果喜不自胜,他找来自己的“笔杆子”阎又文,交代写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,要“长自己的志气,灭共党的威风,同时也给蒋公和美国人显示我们的态度”。

写还是不写?阎又文只好请王玉向中央请示。阎又文把自己的难题告知王玉,王玉如实向延安进行了汇报。这一次,阎又文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指示:这封信要写,而且要写得狠一些,要让傅作义和他的官兵兴高采烈,得意忘形,让我们的指战员看后,在战场上恨不能把敌人一口吃掉。

9月20日,傅作义部队机关报《奋斗日报》刊登了《致毛泽东公开电》,第二天,国民党南京《中央日报》全文转载,大字标题:

**傅作义电劝毛泽东
希接受教训 放下武器
参加政府 促进宪政**

文章提刀者阎又文施展文笔才华,把这篇傅作义致毛泽东的“檄文”写得洋洋洒洒。文章言语犀利,字里行间极尽讥讽、嘲笑、挖苦之能事。

其实公开信着笔之前,已经通过周恩来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。毛泽东确实对那篇文章留下了深刻印象。1949年,北

平和平解放之后,傅作义、邓宝珊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,阎又文随行。

傅作义见到毛泽东,向毛泽东说:“我有罪。”毛泽东说:“你办了一件大好事,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。”随后,有人引见了傅作义身后的阎又文。毛泽东笑着说:“阎又文,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!”

三千地下党暗战北平

1947年底,傅作义升任华北“剿总”总司令坐镇北平,不但有自己的20万嫡系部队,还手握华北地区40万蒋系部队的指挥权。掌握了傅作义的思想动向,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华北地区的军事动态。潜伏在傅作义身边的内线阎又文,作用至关重要。

1948年5月,李克农找来王玉,派他进入北平联系阎又文。其时,党中央已经开始酝酿辽沈战役的战略设想,同时也考虑在华北与国民党进行大会战。阎又文的任务仍然是搜集战略层面的情报:傅作义的政治动向、国民党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和作战计划,傅和蒋的关系。

和阎又文接头后,阎又文把王玉安排住进了北平饭店。此时的阎又文,仍是傅作义的秘书,但军衔已升至少将,兼任华北“剿总”办公室副主任、政工处副处长、新闻处处长和新闻发言人,进入了华北“剿总”的决策核心。他给王玉办了一张《平明日报》的记者证。

每周六,阎又文都会在北海漪澜堂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,王玉就持记者证参加。有关的绝密情报,就通过记者招待会这个最公开的场合,秘密传出去了。

同样是以《平明日报》记者身份作掩护的地下党员刘光人,也在那时与阎又文有过很多接触。

不但阎又文,就是自己在《平明日报》工作时的许多同事,刘光人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。这份国民党的北平机关报中,竟然有20多位记者编辑是中共地下党员。

平津战役后来被视作中共情报工作的巅峰之作。根据平津战役纪念馆的统计数据,当时北平地下党有3000人之众,外围人员超过5000人。

牵一发而动全身

1948年10月,辽沈战役胜利已定。东北问题解决后,就要着手解决华北问题了。

中央最初的战略构想,是先夺取归绥,攻克太原,解放绥远和山西全境,然后集中华北解放军全部和经过休整的东北野战军主力,解决傅作义集团。

针对傅作义制定新的战略,又到了起用阎又文的时候。李克农派王玉再次潜入北平,限两个星期拿到傅作义的作战计划,最迟不能超过三个星期。

仅仅一个多星期后,王玉就从北平回到了东黄泥村,带回了傅作义的计划书。

阎又文提供的这份情报,牵一发而动全身,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都起到了影响。

研究平津战役20多年的北京卫戍区退休干部董世贵,详细整理出了中央对辽沈和平津战役战略不断临机调整的全部过程。

10月31日,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:“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,应休整一个月左右,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,攻击平津一带,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,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……”

直到11月9日深夜,中央解决华北问题的决心还是要先攻克太原,而后再解放平津。

但时隔六天后的16日凌晨,中央军委突然作出决定,4

时致电林彪、罗荣桓、刘亚楼,令其“早日入关,防止敌人逃跑”。5时,致电华北野战军撤回归绥,缓攻太原,以迷惑和稳住傅作义。为了同样的原因,对淮海战场上已经被包围的杜聿明兵团也暂缓攻击。

“如果没有此后的这些战略调整,那么傅作义有可能保存主力,甚至放弃平津退至南方,那将对全国解放进程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。”董世贵这样分析。

1948年11月23日,东北野战军主力分三路提前入关,突然包围唐山、塘沽、天津的国民党军,阻断了傅作义的海上退路。随后华北野战军突然出现在张家口以西地区,发起猛烈攻击,断绝了傅作义西逃之路。

12月14日,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。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。

影响傅作义

围城期间,傅作义顾虑重重,摇摆在战、和之间,情绪极不稳定。他的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着秘密谈判,而另一方面蒋介石的特使也轮番飞到北平,甚至拿着蒋的“手谕”命其南撤。

从1948年12月底到1949年1月中旬,驻守在天津、塘沽、张家口、新保安的国民党部队全部被歼灭。特别是新保安战役中,傅作义的“王牌”35军被全歼,给傅的军事力量和他个人心理造成了巨大打击。

12月25日,党中央宣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头等战犯,傅作义的名字也在其中。

阎又文反过来对傅作义进行了劝导。对傅作义冲击最大的是被中共列为了头等战犯。阎又文对此提出了另一种猜想:蒋介石对你不率部南撤肯定会产生疑。华北丢了再去南方,蒋不会饶过你。共产党正在和我们谈判,这时把你和蒋绑在一起,应该是为了解除蒋的怀疑。

不久之后,解放军密使转来了一封毛泽东亲拟的电报,证实了阎又文的猜测。电报告诉傅作义:“我们这样一宣布,你在蒋和蒋的部队面前地位加强了。你可表示坚决打下去、别无出路。暗里和我们谈好,和平解放北平。”这下彻底打消了傅作义的疑虑,秘密和谈重新开始。

傅作义与解放军的最后一次谈判,阎又文受命作为谈判代表,并对谈判过程进行了详细记录。回到北平,阎又文把与叶剑英的谈话记录交给傅作义阅。傅作义看后沉思良久,最终说道:“看起来,事到如今,只有放下武器这条出路了。”

1949年1月22日,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,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。1月31日,北平宣告和平解放。

北平和平解放后,2月2日,傅作义携邓宝珊、阎又文一起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。

在那里,阎又文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直接领导罗青长,并正式恢复了组织关系。不过,他的身份仍未公开,继续以隐蔽身份协助完成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和绥远的和平起义工作。

新中国成立后,阎又文随着傅作义的部队接受改编,后参加抗美援朝。归国后,被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点名调到水利部农田水利局,任副局长。按照组织的安排,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仍没有公开。

1960年,阎又文调任农业部粮油局局长。时值三年自然灾害,主管粮食生产的阎又文压力可想而知。他常年在全国各地奔波,积劳成疾,于1962年9月25日逝世。

弥留之际,阎又文留给病床上的妻子丁夏秋留下遗言:“有些事情找组织。”随即溘然长逝,时年仅48岁。

据《北京日报》